

导 言

走向艺术的伦理学

一 道德现实的困境

当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了道德的思考。或者说 当人们进行道德的思考时，人类就开始了与自然的区别。道德世界不同于自然世界，最简单的道理在于，道德是人的世界。可以说，人类的伦理思考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围墙”，把人与动物“隔离”开来 显示出属于人的道德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原则界限。

许多世纪过去了，人们一直在构筑着“道德的围墙”，从范畴的筛选到概念的厘定，从原则的探讨到体系的建构……人类关于道德思考、道德建构、道德完善的书籍差不多可以修造一座新的“巴比伦”塔了。

但是，向往道德生活、追求道德境界的人类并没有步入道德理想的天堂。相反，更多的是陷入一种道德滑坡的困境与迷惘之中。在人们的眼中，宗教变成了迷信，科学变成了技术，伦理变成了纪律，经济变成了金钱，国家变成了机器，艺术变成了娱乐，连人类自身也变成了牟取利润和效率的工具^①。事实上，无

参见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5—346 页。

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道德滑坡”之象如一条大蟒死死地缠住人们，使得人类迟迟不能迈进“理想之城”，使得一部分人对于今天的道德文化建设始终不能建立起信心。历经千年不断构造“道德之城”的人类，如西西弗斯般一直深陷在“道德滑坡”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学的处境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年来，伦理学一直就缺少有意义的建树，只是随着人们的道德困惑的日益增长，变得更喜欢虚张声势而已。

柏拉图正是有感于当时雅典社会道德状况的不佳，才竭力要构造出一个至善至美的“理想国”，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诗人们的作品由于对神不恭而可能造成不良的道德影响，他才坚决主张将诗人们身粘羽毛并驱逐出“理想国”。在柏拉图那里，“理想国”就类似于“道德之城”。中世纪，神学家们忙于构造归属上帝管辖的“道德之城”。而因偷吃禁果被驱逐出伊甸园的凡夫俗子却是在道德的忏悔与拯救中度过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使人类从神的阴影中走出来。人类开始睁开自己的眼睛，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并满怀信心地构造起符合人性的“道德之城”。在这座新的“道德之城”的构造中，人类先后寻找到了知识、理性、科学等表明人类的力量与身份的“新式武器”。不幸的是，靠知识、科学、理性武装起来的人类，并没有如人所望地构造出“道德之城”。相反，人类陷入又一次的“道德滑坡”所带来的困境之中。

面对道德败坏的现实，卢梭要求“回归自然”；面对道德精神的沦丧，尼采举起铁锤进行价值重估。但是爱弥儿却一如未开化的野蛮人而不被文明人接纳，而查拉图斯特拉却被迫居于高山之巅并远离人间六千英尺。道德理想的彩虹仍然呈现在思想者的梦中而不能落实于现实生活。就是在现在，就是在我们不远的地

方，就是在我们的身边，不道德的行为仍然存在。不过，最让人痛心的是：不道德的人不再是苏格拉底所说的“无知者”，而是“有识之士”，甚至是所谓的“文明人”；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不道德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显得理直气壮，缺乏起码的羞耻感。

“在纽约社区的北部，四个郊区青少年——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夜间闯入学校，将几桶汽油倒在里面，并点上火，致使学校50万美元的财产付之一炬。他们四个人中年纪最大的孩子是一个优等生，另外三个被媒体描述为‘聪明的学生’。他们纵火的惟一动机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因为缺了堂法语课被教师处罚而心情沮丧。”^①“在布鲁克林，被其邻居描述成‘好孩子’的三个未成年男孩，因为将汽油浇在熟睡的流浪者身上，然后点燃而被逮捕。在警察局录口供时，其中一个男孩子说：‘我们只是想骚扰一下这些乞丐’。”^②都是“好孩子”，却做出了恶的选择；都是聪慧的优等生，却做出如此违背道德良知的行为。更为可怕的是事前他们缺乏同情，事后他们缺乏良知和忏悔意识。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德 M. 亨特在讲授一个有关大屠杀的课程时，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发现，大部分学生都持一种“历史无过错”的历史观。他们都认为，希特勒和纳粹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能阻止。因此，最后，学生们都认为没有人应当为曾经发生的那段历史负责，没有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与悔过。究竟是什么使这些未成年人丧失了应有的道德良知？究竟是什么在背后规范和导引着这些孩子的行为？

托 马 斯 · 里克纳等著：《美式课堂——品质教育学校方略》，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同上书，第2—3页。

当汽油浇向熟睡的流浪者、当硫酸泼向无助的黑熊、当枪弹射向无辜的人群、当因学习上的分歧而掐死同窗、当因一句骂人的话而去投毒……之类的事情不断出现在媒体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对生命的敬畏与怜惜少了，人对人的同情、体谅与宽容淡了。确实，在这个商品日益繁盛、服装日益新潮、娱乐方式不断演变的眼花缭乱而又显得过于热情四溢的时代，人与物的距离近了，而人与人的距离却远了。环顾四周，我们发现，人对物的亲近与热情程度超过了对人的关心与友爱。无论是在美丽的广场或者是在幽静的校园，随处都可见到打扮得“人模狗样”的宠物。它们不仅没有破衣烂衫，而且它们的生活处境远比街上的流浪儿优越。不管是荷兰小猪还是小哈巴狗，它们无一例外地吃香肠、喝牛奶，偶尔还喝点酒，其生活待遇无疑要比边远山区的失学儿童好。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年轻而精力旺盛的学生们特别喜爱小动物，他们给予这些宠物与自己相等的待遇——同吃同睡、同玩同学。但往往是这些与宠物相交甚好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却往往不知所措：他们能很好地照顾宠物的一日三餐，却不能排队进餐以致餐厅里的“战争”连续上演；他们能给宠物一个很好的窝，却不能在教室里给同学让个座以致因抢座而拳脚相见；宠物受伤他们会将其送至宠物医院并流下伤心的泪，但他们自己在打斗中鲜血四溢却不知怜惜……对物激情满怀，对人却情趣低落，这是一个热情与冷漠并存的时代。这是一个宠物的时代，这是一个“物的尺度”高于“人的尺度”的时代。“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是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①这是一个重事实判断轻价值判断的时代。道德不仅在滑坡，更为可

①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945 页。

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道德冷漠症”。中国延续几千年的道德文化，一方面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刷，随后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摧残，传统价值观念呈现日渐衰落的颓势。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的“道德冷漠症”是从否定的角度对于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也可以说是对传统道德规范的一种蔑视与不信任。他们以一种消极的形式来解构传统道德。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一切神圣的东西无不贬值。惟一被他们看重的是及时行乐、享受物质，不需要考虑明天也没有明天。正是在这种玩弄与调侃中，传统道德规范被消解。人们在嘻嘻哈哈中消解传统道德观念，最终却走向了对道德本身的消解，呈现出道德虚无主义的取向。道德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道德言语更多地成了人们口头上的体面表达，道德的崇高性甚至沦为笑柄。可怕的是这不仅仅表现在年轻人中，而且广泛地存在于当代社会中。当有人为荣誉而战时，有人会说“荣誉是一堆废纸，只有老鼠才去啃它”；当有人为责任而受累时，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十足的不会享受生活的傻蛋”；当有人因同情而资助他人时，有人会说“这是一个有钱没处花的孤独者”……

一首名叫《垃圾场》的歌最能表达人们对道德滑坡现象的披露：“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王朔小说《玩的就是心跳》中的主人公是这样教导他的女朋友百珊的：“记住，说什么你都听着都答应着完了就完了千万别当真，要不你得挨涮。”王朔笔下的顽主们拿天安门的庄严的卫士开涮，拿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献身精神开涮。他们穷极无聊、醉生梦死，却说自己是“血沃中华”，胡说八道、为非作歹，却自命为“活着的雷锋叔叔”，敲诈勒索、恣意妄为，却要说“说

不定哪天李玉和的手铐脚镣就戴我身上了”。把玩弄过的前一个女人扔下的破皮包随手送给下一个女人，却说“当年，你嫂子就是凭着这种劣势装备推倒三座大山”；在准备闹人时，还对被闹者说“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正经、正统在失落，平凡、诚实几近乏味无能；责任、“使命”、“道义”被放逐、被嘲弄，最粗俗的东西摇身一变成为时尚^①。这些人放弃了对他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甚至放弃了对自己的责任。能混就混，能玩就玩，一切都在嘲弄和调侃之中，不堪入耳的脏话与玩世不恭的行为成为他们亵渎一切圣洁、美好、崇高、真诚的武器。信义、勇敢、真诚、责任、尊严等等一切支撑世界的道德观念都被他们糟蹋得面目全非。

他们不仅没有道德选择的快乐、道德选择的困惑，他们甚至连道德选择的意识都缺乏。他们是一群“空心人”、“无心人”、“双面人”、“橡皮人”。他们拒绝道德思考带来的痛苦、他们拒绝脱胎换骨长大成“人”。他们希望自己能像婴儿一样永远“无忧无虑”地活着。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他们像“阿 Q”一样祭起“精神胜利法”的大旗。在困境面前，他们像蜗牛一样能伸能缩，像变色龙一样随境而迁，惟独忘记了自己是谁。于是，他们可以忍受种种不便并安适自得，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没有完美无缺这玩意儿，哪儿都一样。比如《顽主》中的主人公就觉得：“活着没劲”、“没劲也得活”；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个球，但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地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当老头子挨着儿子坐下，说“严肃点”、“我要了解了

^① 参见张德祥等著：《王朔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 页。

解你的思想，你每天都在干什么？”儿子却漠然地回答道：“吃喝、说话儿、睡觉，和你一样。”一切都是全他妈胡扯淡，全是瞎掰，全是一场空。他们对什么都无所谓都很漠然，甚至对犯罪心理也心安理得。他们虽然没有多少学识但却具有蔑视学识的“勇气”；他们虽然并未为社会创造多少财富，但却善于嘲笑那些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他们拒绝思考，拒绝反省，拒绝痛苦的“沉”、选择快乐的“轻”的生活方式。他们乘着“轻风”，以局外人自居，津津乐道于社会舞台上的各种演出，冷眼旁观和揶揄嘲弄是他们的生存哲学。对于世间的一切，他们都不持认真负责的态度，甚至连人世间最为纯洁的爱情，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不爱任何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主人公张明说：“‘爱’这个字眼在我看来太可笑了，尽管我也常把它挂在嘴边，那不过是像说‘屁’一样顺口。”美国现代派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在长篇小说《野棕榈》中写道：“今天世界上没有爱的地位，我们已经把它消灭了。要是基督现在回来，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就得很快地把他钉上十字架。要是维纳斯回来，她就会变成地下铁道的厕所里的一个肮脏的家伙，手里是满满一把法国春宫图。”^①道德的世界、良知的世界坍塌了，“我”成了一个没有情感、没有良知、没有责任感的“橡皮人”“活死人”。

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越来越漂亮的服装下面、在越来越美丽的面孔后面、在越来越亮丽的双眸深处，有一种至上的东西正在迅速老去、死去；在越来越布局考究、设计精美、高楼耸立的城市形象的背后，有一种源自生命深处的东西正

^① 转引自朱水涌：《文化冲突与文学嬗变》，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

在远去、消失。用贝塔朗菲的话来说就是：“简而言之，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是却在征途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①人是灵与肉的结合体。物质性的肉体与精神性的灵魂的结合使人不同于动物，也不同于神灵。没有灵魂的人不是人，仅有精神生活的人不是人而是神；没有物质生活的人是不存在的，仅有物质生活的人也不是人而是物。完美的人在享受物质的同时提升精神，完美的社会在创造物质的同时提升道德。但不幸的是，现实中的人与现实中的社会在享受与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遗忘了精神与灵魂。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架失衡的天平。物质的丰富与科技的进步，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生活的舒适与惬意似乎是以心灵的钝化、良知的麻木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机械文明的发展，人被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所征服所同化，人在巨大的流水线工程中演化为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在享受电脑键盘带来的快乐与便捷时，我们的一切都被数字化、科学化。我们的思维受制于科学编程，凡是不能被数字化的均被删除、被忽略或被肢解。最后，受制于科学思维的人的丰富的情感、感觉的多样性渐趋单一化、平面化。人在大饱物质快餐的同时，精神触角被钝化、精神生活被简化。而简化的精神生活不仅没有提升人的精神层次与道德情感、保持人对物距离。相反，促使人们更快地沉湎于物质享乐、全身心地投入到“物质颂”的歌唱中。于是，享受物质快餐的人类开始了对精神快餐的猎奇。恋爱速配、模仿秀等一系列为快乐而快乐的节目，因迎合了人们对精神快餐的需求而一炮走红，成千上万上亿的人们乐此不疲地沉迷于此类快餐节目中。沉迷而不思考，享受而不体悟，追逐时

① 贝塔朗菲：《人的系统观》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尚而不反省，人们在大饱精神快餐、走向世俗生活的途中，离自己的心灵越来越远。

结果，物质日渐富裕的时代却成了一个精神更加贫困的时代。善于编程、精于计算、享受科学的种种便利的现代人，精神生活却日益贫乏。沉溺于物质的欢乐海洋，人们拒绝反思、拒绝痛苦，他们不能也不想向上飞升。为了享受物质的极大丰富，他们甚至以精神的“安乐死”为代价。这是一个与歌德的“浮士德”完全不同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被颠倒的浮士德”。于是，在表现当代人的作品中，我们再也看不到挺身忍受孤岛寂寞的鲁滨逊，看不到一生与海洋搏斗终于被海洋吞没的老水手，看不到像追逐一个情人那样追求一个“仇人”（白鲸）、最后与它同赴深渊的船长，看不到忍受了肉体 and 灵魂几十年熬煎的冉阿让，看不到不懈地追求一个人永远不可企及的梦境——灵魂永生的卡拉马佐夫以及克利斯朵夫。在现时代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那种撕碎人的情感，以压倒和毁灭之势震撼人的理性和良心，从而把它们唤醒的伟大悲剧^①。

在一个物质主义、技术文明盛行的时代，属于人的精神、情感、道德被忽略或被轻视。人们注意的是摄取物质钙，忽略的是保持精神骨头里的钙。人沉湎于物质的享乐而懒于精神方面的思考，人的生命在“新陈代谢”的消耗中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在古代乃至近代，“道德之城”虽然只是一个理想，但人们一如西西弗斯一般努力地营构这座“道德之城”。而现当代的一些人，面对道德滑坡的现状，却拒绝道德反思的痛苦。他们将对道

参见何新：《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4 页。

德的追求化为对道德的玩弄，他们不仅背离了西西弗斯精神，而且也背离道德本身。道德在日益轻松与物化的生活方式中被冷落，美德走出了昔日的“神龛”。

是时代导致了道德的滑坡吗？是技术冷冻了人的良知？是物质堵塞了人的道德之路吗？究竟是什么使人在物质面前失去了人应有的高贵？是什么使人在拥抱物质的同时贬低以致遗忘了道德？……这些都是我们时代特有的道德困惑。

今天，“道德”成为当今思想论坛上的热门话题。一系列的“道德滑坡”现象使一些清醒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道德建设问题。一系列的道德失范也把每一位存在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处境之中。正是这种潜在的危险促使众多的“清醒者”走上前台，来关心道德建设问题，来探究“道德滑坡”的根源。

二 道德困境的根源

导致我们时代的道德困境的根源至少可以从技术和教育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1. 从技术的层面来看

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日益加剧，随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和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生活的一切都深深打上了科学技术的烙印，科学技术几乎成为无所不在的力量，直接左右着社会发展的程度，并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道德观念。

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自在自为的演进过程。而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

力量的确证，能使社会摆脱现有的苦难，进而走向完善。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为社会的发展带来辉煌的前景。在辉煌灿烂的工业文明成果面前，越来越多的人更是产生了对科学技术无批判的崇拜心理，把科学的公理当成了无可置疑的预设、绝对真理的模型、无限完美的象征，极力美化科学技术的力量，充满乐观主义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人们普遍相信，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创造者和道德进步的原动力，断言科技进步与道德发展之间具有线性的正比关系和简单的对等关系：科技越进步，道德越发展；科技每前进一步，道德就相应地发展一步。这就是道德问题上的科学决定论、技术统治论。似乎道德的获得在于完善知识、拥有真知，拥有真知的人必然会成为道德的人。然而，事实不断表明，科学并不能也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的问题，科学与道德二者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方面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人类得到了物质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道德问题上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

如果说现代社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那么，科学技术就是打开魔盒的“潘多拉”。的确，科学技术为人们走出对自然的恐惧提供了披荆斩棘的神剑，为人们过上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提供了各种保障。但是，“神剑”既造福于人类，也造孽于人类；“保障”既使人生活幸福，也使人贪于享乐、失去原始的生命灵气。特别是当科学技术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人类的各个生存领域，成为人类之城的支柱与核心的时候，科学技术的负效应就日益彰显了。有学者指出：“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人们在所有知识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迫使他对于他自身的以及他同世界的关

系的概念，忍痛地作了全面的修正。^① 建立在现代科技进步基础上的现代社会，伴随着物质财富的现代性突进，却没有带来精神财富的同步增长。相反，却出现了“主体的空场”。人性、人格、人情这些美好的东西似乎都在科学之剑的威逼下丧失殆尽。

首先，科技进步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的理性精神拓展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但同时也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原有和谐，导致了人对自然的粗暴干涉和掠夺性开发，导致了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染严重。科学技术的发展致使人类陷入到生物圈与技术圈的深刻矛盾中，造成了人对自然的征服与自然对人的报复的恶性循环，导致人与自然走上了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导致人与自然之间不能建立起一种以“敬畏生命”为基点的道德关系，导致道德权利、伦理关怀的理念无法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在这里，一种以全面的关爱的态度对自然进行合理的支配和利用，把发展科技和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的内在尺度和生态环境规律的外在尺度有机结合起来的环境伦理和生态智慧就无从生存。

其次，科技进步改变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技术社会。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了单一的技术关系。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技术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尺，成为一种新的极权主义者。技术取代了昔日的宗教，变成了现代社会的新宗教。技术以它无所不在的统治操纵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最终导致了技术异化。技术异化作为科技社会的特有现象，使得现代人与社会之间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科技进步创造了一个富裕的社会，然而这个社会却是异化的、单面的、畸形

^① 雅克·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22 页。

的，人在这个社会里处处听凭作为意识形态的科技的奴役和压迫，不能过上符合人性的和谐生活，人与社会之间不能保持健康的协调关系。在这里，社会的发展成了主体发展的包袱，科技造成的社会科层制结构使得人只能服从自己造就的机器的逻辑，而不得发展自己道德上的自由意志。

再次，科技进步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科学技术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却扩大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使人与人之间缺少亲情与爱意、理解与信赖、交往与关怀。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通讯手段，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但现代人却感到了空前的孤独和失落，难以找到天长地久的心灵对话伙伴。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功利化、经济化、冷漠化、商品化，总之，变得非人道化。汤因比说：“生活在巨大公寓群中的人们，彼此只是物理意义上的邻居，个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接触。”^① 马尔科维奇也说：“技术的文明创造了各种方法来克服人与人之间地区的和时间的距离”，也创造了“强大的分离因素”，“其后果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过分隔离，互不往来，互不理解和偏执，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②

显然，科技进步并不一定能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科技进步和道德完善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虽然科学技术以其非凡的科技伟力解决着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问题，却对价值理性问题从来就显得无能为力，并且还使社会生活出现了道德文化生长的断裂，面临着道德失范甚至道德沦丧的困境。关于科技进步与社

^①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43 页。

马尔科维奇等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179—180 页。

会道德的完善之间非线性相关，近、现代思想家都已敏感地觉察到。卢梭说过：“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并且这一现象是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的。”^① 马克思也揭示过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② 现代思想家贝恰说：“微微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技术上的新突破口，不断地给人类带来明朗的希望。但这种希望最后不过是梦幻，不，甚至可能是陷阱。”^③ 池田大作也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从环境世界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并利用这种力量，在物质上实现了富饶、优裕的生活。在今天的发达国家，市民平均所享受的丰富的物质生活，恐怕古代和中世纪的王侯也会感到羡慕。可是，另一方面，现代的人类却把这种物质的力量用作可怕的武器，互相威胁，而且在现实中已经杀伤了大批的人。人们获得了丰富的物质，却丧失了人生的生活意义，或者由此而走向杀伐的犯罪，成为一种绝望感的俘虏。”^④

这样看来，科学技术很难说带来了社会的道德进步，因为它不仅没有带来人的现代化，反而把人置于工业文明的高压下，使人的发展受到贬损。一方面是最新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是严重的人性衰退。历史从来没有像现代技术社会那样充满了反主体

①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4 页。

《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页。

同上书，第 174 页。

性、反道德性。其实，马克思很早就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①由此可见，今天的道德困惑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2. 从教育的层面来看

如果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影响了人类道德水平的向上伸展，那么，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的不足，可以说是造成道德困境的直接原因。正如卢梭很早就指出的一样：“有一种毫无意义的教育在虚饰着我们的精神，腐蚀着我们的判断。……人们都不惜巨大的代价设立的无数机构来教导青年以种种事物，但只有他们的责任心却被遗漏了。”^②

(1) 教育观念上：重“知”轻“德”

也许是机器文明所附带的功利性使然，也许是社会竞争的压力使然，几乎每一个家长从孩子幼儿时期就关注他们成绩的好坏、几乎每一位教师都把分数的高低与学生的优劣画上等号、几乎每一位老板都把员工的业绩与员工本人等同起来……无论是家长、教师还是老板，在他们的评价取向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共通性，那就是：重知识轻素养、重技能轻品格，重理性轻情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版，第4页。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页。

重知识轻品格的观念，不管它源自学校、家庭还是社会，只要它存在着，就会对我们的教育产生极大的误导。

首先，它侧重于教育的专业性与技术性而忽略教育的丰富性与立体性，注重知识教育、技能训练，片面发展人的演算、推理等理性能力而忽略人的情感培养，结果把人培养成为缺乏丰富感性的“单面人”。这种“单面人”往往是计算机高手、外语尖子、业务能手，同时也往往是对他人、对环境、对社会漠不关心的人。有人就曾尖锐指出，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为了促进技术的持续进步而安排的，其目的是培养大量的技术后备军。中小学教育是为学生接受科学技术作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大学则着力培养各类专门的技术人才，专业口径被定得很窄，而这又是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所必然要求的，于是学生的理智素质就多半只能在这种狭窄的轨道上发展，这种情况还被未来的择业走向和社会上的高报酬行业所强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社会上形成的各种专业热如计算机专业热、外语外贸专业热、法律专业热、会计专业热等“热”中得到证明。人文类的专业被冷落，根本就“热”不起来。曾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圣贤推为至尊的“哲学”，根本得不到学生与家长的青睐。被哲学系招进来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被调节过来的。在这里，教育与人精神的全面塑造和涵养已经没有什么关系，教育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本性，而成为一种手段。

其次，它促使主体关注与知识相关的物质世界，而忽略与社会相关的价值世界，把知识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在知识的多少与德性的高低上画上等号（知识就是美德）。在这种重“知”观念的左右下，“我们不再问一个人是不是正直，而只问他有没有才华；我们不再问一本书是不是有用，而只问它是不是写得好。

我们对于聪明才智就滥加犒赏，而对于德行则丝毫不加尊敬。漂亮的文章就有千百种奖赏，美好的行为则一种奖赏都没有”。^①其实，知识的丰富与德性的高低并不是对等的关系。一个极有学术造诣的人，可能是一个极为卑鄙龌龊的人；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可能是一个德性极高的圣人。有的人在学术领域成就显赫，然而，在道德方面却被人不耻。韩愈的文章与才气使他成为唐宋八大家，但他的“前恭后倨”的丑态却为人不耻。元稹靠他的才气与白居易齐名，但他“始乱终弃”的绝情行为却被天下有情人痛骂。现实生活中，许多有学识的人在诚实、正直、忠诚和责任感方面，远远不如许多大字不识一个的人。

在知识与德性方面，有知识的人固然被人崇敬，但有德性的人更能赢得人们的尊重与内心认同。伯瑟斯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你总是说要尊重有学问的人”；我表示认同，但是，与此同时，不要忽视了有宽阔的胸怀、思想的深度、高尚的鉴赏能力、涉世的经验、优雅的举止、行动的策略、充沛的精力、对真理的追求、诚实的为人与和蔼可亲的态度——在一个学富五车的人身上，或许这些品质都不具备。^②因此，“我们判断一个人，更多的是根据他的品格而不是根据他的知识，更多的是根据他的心地而不是根据他的智力，更多的是根据他的自制力、耐心和纪律性而不是根据他的天才。”^③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人的知识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一个人的品格的养成，那么，我们很可能是在加速地毁灭这个人。对此，塞缪尔·斯迈尔斯警告道：如果一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31 页。

^② 转引自塞缪尔·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 页。

同上书，第 8 页。